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四六期 ——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406b)

---

【文献资料】	从秦城监狱里暗中挟带出的短信 (《邱会作家书》代前言)	程 光
【史料摘选】	《邱会作家书》摘选	邱会作
【史海钩沉】	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	李海文
【百家争鸣】	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汪有芬
【历史真相】	王秉璋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文 贝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文献资料】

从秦城监狱里暗中挟带出的短信  
(《邱会作家书》代前言)

• 程 光 •

这是半张残破的纸片，它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1）。这是父亲邱会作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时偷偷写的（2），1980年6月由我们探监时暗中夹带出来。纸上的大字是监狱工作人员写的供在押者借阅的图书目录，小字是父亲的手迹，写在纸的下边空白处和背面。他利用私藏下来的半张纸片，写了个短信。

父亲在这半张破纸片上写的内容是：

1）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开始重新进行审查（3）。今年四月底以前为全面审查，五月以后几个问题重点审查。目前正进行揭发交代，也可以说是深挖。深挖的高峰已过去。对我来说，无论怎么挖，也只能挖出一只空棺材来。何时结束不得而知。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我都不害怕，因为我对自已有什么问题始终是心中有数。勿念。

2) 这次的来人不善，我亦不惑。至今为止他们得到的是：(一) 同林的关系、(二) 反对、(三) 死人(4)。“武”“谋”“逃”他们始终未正式提出(5)，只有影射。我则有什么说什么。对我的交代，他们多数似满意。

3) 在整个审查中，他们的言谈：吉凶并重。对前者不幻想，对后者不惧怕。他们流露过，下面提出过要公审。这可能，似乎不会这样办的，即使如此，我也毫不在乎。

4) 他们公开说过，出去的日子不会很久了。又说，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几个人的问题。我估计，我们四个人会一起处理(6)。以我推测，他们未必抓到了黄、吴“武”“谋”“逃”什么证据。

5) 我写的这点意事[思]，路光可能理解得多一点(7)，因为前两次你们来时，他的一句半句的说话就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路光这次可能不来。你们可把意思抄给他。不要给你妈说。以免增加她的负担。此件绝对不可外传。千万，千万！

我的凄惨这不说了，但愿有面谈之日(完)

只有这一片纸可利用，故写得很简单。我知道你们七一前后会来的。又及。

现在我找出这封信重新读，好像又回到三十多年前。

1971年9月24日，我的父亲邱会作被“隔离反省”，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们不知他在哪里，是生是死。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老干部被批斗关押折磨去世后，实行严格保密，根本不通知家人。我们担心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这。

1979年底，我们接到公安部的通知，可以到秦城监狱探视关在那里的父亲。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天大的喜事，知道了父亲还活在世上。遗憾的是，因为我在无锡工作，于次日早上赶到北京不可能，错过机会。1980年2月又通知可以到狱中探视时，我和爱人提前带着不到两岁的女儿匆忙赶到了北京。我们到了秦城监狱，看到了久别十个年头的父亲。他非常消瘦，面色灰黯，衣衫褴褛，一付饱受折磨的样子。但他思维清晰，目光有神，显示出坦荡不屈的神情。探视时间不到一小时，旁边有公安干警监视，父亲不可能说什么“份外”的话。那一年6月，公安部又通知可以探监，我因正在外地出差，不能赶去。事后，我的兄弟把一个残破的字条给了我。它是父亲私留了监狱里囚犯借书时传看的一张目录纸的半张没有归还，利用它空白处和背面写了一些话，偷偷藏在身上多日，已磨损得近乎破碎。纸上面沾满了污渍，但字迹清晰，意思明确。等到家人来探视的那一天，父亲和子女们紧贴着坐在一起，任凭看守人员在旁边盯着，全然无事一样。父亲察言观色，趁着看守松懈之机偷偷地把字条塞在子女的手里，带了出来，最后传到我这儿。我仔细地看过之后，把它小心收藏，直至今日。

这个纸条原始地记载了一个被关押与世隔绝多年的人所知、所想，和对事态发展的推测。它虽然只有五百多字，却把我们当时想要知道父亲的状况简要地说明了。主要是：

1) 自一九七一年九月后，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揭发运动已历经九年，虽然指责父亲他们的“罪名”在铺天盖地宣传，说的耸人听闻，可居然对他拿不出什么可信的证据。父亲说对自己有什么问题始终是心中有数，这令我们放了心。那个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至今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仍然不公开相关档案，像一个“谜”一样留在那里。

2) 揪着父亲不放的问题是三个, 即和林彪的关系、反对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单位里死人的问题。这些被认为有据可查, 坐实了案情。然而, 它们却都是人事历史关系和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当权者想抓的“要害”被父亲概括成“武、谋、逃”三个字(即武装政变, 谋害毛泽东、企图外逃), 对这么大罪行, 却不敢理直气壮对他们正式提出, 只是影射。那时, 在全国作了那么多大批判, 说出那么多“证据”, 扣上那么多“帽子”, 恰恰是“武、谋、逃”这最为关键处没有举出真正的证据。当权者虽然信誓旦旦, 其实有些心虚, 在父亲面前闪烁其词, 躲躲闪闪。我琢磨这一反常态的举止, 岂不是正好证明了父亲的无辜。

3) 父亲说, 对他们的审查是软硬兼施, 吉凶并重。当权者自己想要公审, 却说是下边提出来的, 显得有些虚伪。与此同时, 又言称不久就要释放他, 这种矛盾心态显出了没有证据情况下的某种无奈。当然, 这也可能是在对父亲进行诱供, 或是对自己手握他人杀大权的一种炫耀。但无论那种情况, 都不那么光明正大。这个早在公审之前就由当权者预先钦定下来的内幕, 令人感到它有政治报复和羞辱的意思, 把法律当作打击政敌的手段了。

我刚拿到这张纸片时, 反复阅读, 思索着字里行间的信息。父亲说的“九一三”的情况, 居然和当局的宣传是如此天差地别。我提醒自己不要感情用事, 毕竟父亲是与世隔绝多年的人, 只在这个纸片上写了简单几句话, 事情还得小心观察, 要看真相如何。毕竟, 最具权威的不是权力, 不是高居权位者的意志, 也不是蒙难者一方的表白, 而是事实! 在社会公正和人类良知面前, 它们必须公开。然而, 事与愿违, 当权者躲闪了父亲涉及“武、谋、逃”事实举证, 避开了“九一三”的认真查证, 急于对他定了罪。之后相关事态演化和真相的逐步披露, 正是如父亲当初在狱中判断的那样发展了下去, 这令我惊奇不已。

当时初读这封信, 我很悲哀。父亲那句“我的凄惨这不说了”的话, 道出了他受到的肉体摧残和精神迫害。文革中对我们这样的子女都不肯放过, 往死里整, 更不用说对待他了, 这我深有体会。父亲写过这张纸条后几个月里, 承受了密集的人身折磨, 并被施以公审, 判处16年有期徒刑。这对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我曾想, 父亲要恢复虚弱病残的身心, 须要相当时日, 也可能从此他就会默默无闻、终老到死。或许当局也是这么认为, 那些判罚会变成“铁的历史”, 不容任何人窥视内幕, 可谓“盖棺定论”了, 即便释放了父亲, 也永远剥夺了他的话语权, 哪怕是对他解除羁押也无妨了。

父亲在公审中刚被定下如此“弥天大罪”, 判了长期徒刑, 却被立即释放安置。这个突然而来的颇具戏剧性的事, 对我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父亲曾写着, “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 我都不害怕, 因为我对自已有什么问题始终是心中有数。”仔细品味此话, 看来他对自己以后要作些什么, 早已有了打算。

果然, 父亲刚刚有了点自由, 在身体还很差的情况下, 不顾治病养伤, 立即开始了写回忆资料。他克服各种困难, 认真勤奋地工作, 笔耕不止, 直到2002年他八十九岁去世之前。

父亲留下了数百万字的回忆遗稿、谈话录音、短文, 专题著作、书信、日记等。他以亲历者的目光, 重新审视反思了他经历的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之路, 特别是他亲历的文化大革命。父亲在写作之中走完了他生命最后二十一年的路, 其中的艰难和辛苦, 难于言表。但他竭尽晚年倾心之力, 留下大量真实的史料, 成就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奉献。在这里, 我从父亲那些年里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中选出二十七封, 向读者展示他的那段经历, 并把它们集成一部《邱会作家书》出版, 以纪念为此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敬爱的父亲的一百年华诞(1914——2014)。

这些信的原始手迹影印件在书中全部展示了出来, 但读起来多有不便。我把每封信都用印

刷体文字刊印、配以注释，后面再写一些背景情况介绍。希望这样能够有助于读者进行阅看和理解。父亲的信按着时间顺序先后排列，一一串起来，其中还插入了一些信中提及的手稿、信函、录音稿和相关作品作为附件，把它们和那些信配合起来看，更能显示那二十多年来父亲的心路历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2014年4月

注释：

〔1〕这是长约19cm，宽为13cm的半张纸。上边的内容写在了正反两面上。这里展示的是原件的正面和反面扫描图像。

〔2〕秦城监狱为1950年代修建，位于北京北郊秦城，是中国关押高级政治犯和不同政见人士的专用监狱。

〔3〕1971年中央专案组曾对邱会作等进行过审查。这里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重新再对他们进行的审查。

〔4〕指“同林彪的关系、反对文化大革命、总后机关在运动中有人死亡”等三个问题。

〔5〕指“妄图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外逃”等罪名。

〔6〕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他们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于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

〔7〕路光，指邱路光，邱会作的大儿子，程光的哥哥。

编者按：本刊征得程光先生的同意编发《邱会作家书》的代前言和部分信函的内容。《邱会作家书》汇集了邱会作的众多书信、手稿、录音修改稿手迹。它们记录了邱会作在1981年解除羁禁后长期受监管的艰难处境以及家属受到的株连。再现了他克服困难，认真总结历史，洞察中国现实，历经二十年完成了回忆稿的过程。其中对“九一三事件”的忆述、对“文革”的评析、对中国专案专制的批判、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观察、思考，尤为精辟。

□ 选自程光编注《邱会作家书》，明镜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

# 【史料摘选】

## 《邱会作家书》摘选

• 邱会作 •

1981年10月8日致程光的信

承光：

你十月一日的信七日收到了〔1〕。我认为你考虑的问题很好，路光也说，你考虑的问题很有道理。我初步决定按照你的意见办理〔2〕。

根据你提出的大纲，我同路光研究准备写三个问题。一是邱××死党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是说明不存在什么“死党”，只有工作关系。死党是人为的。总后打击的干部是史无前例的，被打掉的处以上干部数以百计。二级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所留无几〔3〕。而打掉这样的干部就

是以划分“死党”而把文化革命的问题混淆（成）了敌我矛盾。二是保邱派的问题。文化革命开始，即一九六七年的春（4），李曼村同总后某些人相结合（5），把总后搞的乱透了。李曼村把总后的乱作为种的文化革命试验田。李曼村支持、指挥二医大、总后的“造反”派把总后搞的翻了天（6）。当时总后极大部分的人都反对搞四大（7），特别反对打砸抢。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两派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的保邱派事实上是保卫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并非保邱一个人。“9·13”之后打砸抢（派）得势了，自以为正确，多数都升官了，而把所谓的保邱派就几乎荡尽无余了。打砸抢派是反“二月逆流”的产物（8），这样就等于承认了“二月逆流”或者说承认“9·13”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在这节之内我要点出王瀑声、陈政、张景昌（营房部新提拔的副处长）三个人的名字和揭露他们的罪恶（9）。三是，对邱的家属亲友的株连问题。这个问题要写的是很多的，只能重点的写一些。

以上是我们研究的大概提纲。内容不详述。

这封信，我以相信党、关心党的团结来写，对个人问题一字不提。中心问题是要表明，我是关心因我的问题而受株连的人，并非是自己在做什么文章。我也会明确提出，天大的问题由我承担责任，而不要株连无辜的人。

我打算向李先念写信（10）。因为十年前同他有很多的工作关系，写起来比较自然。这样的信他必然会转呈胡等领导人看的（11）。

我出来以后，是我第一次同中央领导人直接写信。信的内容不管写的如何，都是事关重大的。我刚出来，情况不会一成不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一言不发为好，还是发言为好。这个问题我还有所考虑。你也可以多想一下，并将你的意见尽快告诉我。我即便写信也在本月底左右才上送。

我在这的情况，路光会告诉你的。原来给我们找的不像样的地方现在都吹了。我们要找到一个落脚点还有很多的困难。

我的日子过的很好，望你和小陈不要惦念（12）。上次你寄给我的悻悻的照片（13），孩子好像没有以前神气了。我看到孩的照片之后，心里多少有些想法（14）。

父字 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

注释：

（1）邱会作于1981年9月12日离开北京秦城监狱“保外就医到西安，很快就收到程光写去的信。

（2）程光在信中建议父亲要及时把一些历史真相回忆写下来，并写了主要问题的大纲。

（3）总后在文革中受审的干部数以千计。不完全统计，有总后部级领导八人，军级干部五十余人，师团级干部一千余人。

（4）指1967年春节前后发生了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继而在国家和军队领导机关，在全国各地，开始了全面夺权的高潮。

（5）李曼村（1917—1996），山东章丘人，1938年参加革命。时为总政宣传部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院校组组长。

（6）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为总后直属院校，校址上海。该校学生在张春桥支持下，成立了军内第一支造反派“红色造反纵队”，参加打倒上海市委、市政府，成为“一月风暴”夺权的发起单位之一，继而到北京总后机关造反夺权，搞打砸抢活动。

〔7〕“四大”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鼓励群众采取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简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大”被取缔。

〔8〕1967年2月部分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反对中央文革的一些错误政策，被毛泽东打下去并指责为“二月逆流”。

〔9〕王瀑声，文革前为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陈政，总后政治部干事；张景昌，总后营房部干部。他们是1967年“一月风暴”后向总后党委夺权、武斗迫害领导干部的总后造反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10〕李先念（1909—1992），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革中一直坚持领导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11〕指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1916—1989），湖南浏阳人，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加入中共，1981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2〕小陈，指程光的爱人陈雪中，医生，受过严重株连和政治摧残。

〔13〕慊慊是程光的女儿的小名，两岁时曾随程光去秦城监狱探监看过爷爷邱会作。

〔14〕邱会作因自己的冤案致使子女和后代受到株连迫害感到难过，对党内政治生活中搞株连家属的陋习痛恨，认为应当杜绝。

#### 收信人介绍背景情况：

198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审宣判后不久，我的父亲邱会作在秦城监狱里就被告知要恢复他人身自由，具体以什么名义，到何处去，哪一天出去，都是保密的。9月12日，父亲离开秦城监狱，乘火车于次日到达了陕西省西安市。父亲离开北京前，家人想见一见，我也想从无锡赶到北京去看望他一下，但是受到拒绝。我的母亲和兄弟当时就在北京，也被告知不许去送父亲。我哥哥邱路光只好先行到西安等候他，以便安排生活和照顾。我父亲刚离开北京，家人就把把消息告诉了我。我于父亲到达西安后第16天、即9月30日知道了他们的确切地址，马上写了一封长信去，并于10月8日收到了父亲的回信。

这封信是我父亲从狱中出来之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也是他一生中给我写的第一封信。我于1968年离开北京清华大学到广州部队当兵锻炼之后，父亲因为工作非常忙，很少顾及家里，如果有什么事情，都是我母亲胡敏给我写信或打电话。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与家中失去了联系，断了音信。经过十年艰辛磨难，我们父子开始通信时，父亲已是67岁的老人，而我也是35岁的中年人了。

我们父子互相写信，第一封就是谈论着一件重要的事，要还原我们国家被封尘的那一段历史，把事实真相留下来。父亲从此开始了这项重要工作，一做起来就不能停手，直到2002年他去世前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仍然是谈关于写回忆的事。我目睹了父亲为写好回忆录所走过的他生命最后21年。

父亲到西安后由陕西省公安厅监管，被安排住在西安东郊长乐东路的普通居民区，居住的是因城市扩建和搬迁而建的安置居民的简易房。房里摆了几件简陋的家具，如果要维持最简单的居家生活，还得购置很多日用物品。但是，父亲每月生活费只有一百元，扣除房租水电等开支及诸项杂费之外，所剩不多，因此生活非常拮据。当时，我母亲的“关系”还在“监督劳改”所在地陕西省大荔县农村。虽然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她已回到北京向纪检部门进行申诉，但没有恢复工资，只能临时挤住在北京我小弟弟工作的工厂集体宿舍里听候回复。而我哥哥路光因受株连被关押在总后甘肃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军马场审查和劳改数年，那时已从羁押地回到了原来的部队，等待最后的组织处理。好在他所在的部队比较通融，允许他在接到正式的审查处理结论之前的期间内，可以暂在“家”等候。于是他请假到了西安，陪伴照料父亲。

父亲这封信的一开始提到他“考虑的问题”就是要写申诉，把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回忆写下来，以说明真相弄清事实。我认为应当回忆与澄清的问题很多，可以先对不久前公审时检察官对父亲公诉词和判决书上“定罪”的一些指控直接回答，这些已经摘要地刊登在公审前后的报纸上了。我把它们摘出主要内容并抄录出来附在给父亲的信中了。至于对其他一些“罪名”的反驳，可以放在以后再写。

父亲赞同我的建议，立即开始了工作。他最早写的是三个问题：1、对总后高级干部的株连应当停止；2、总后“保邱”派的群众不是反革命，应当解脱；3、家属亲友受株连的情况。

父亲首先想到的是总后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他们被整得很惨。仅仅初步统计下来，被打倒的有总后部级领导八人，军级干部五十余人，师团级干部一千余人，实际数字要远比父亲信中说的几百人要严重得多。

父亲此时才知道，我的祖母早在十年前的1972年就在医院中被停医停药后活活饿死了。父亲本想这次出来可以看到她，但是得知的却是噩耗。父亲说，一个无辜的老太太难道就这样死了？就是用那时尚在软禁审查中给父亲生活费中的一点点就可以给她一口饭吃呀！她可是个老革命，曾为苏维埃革命上过战场，是支援红军的模范。对她这样的老人虐待，实在太残酷无情了！这次我的母亲没有能来西安团聚，也让父亲感到很难过。父亲知道我母亲虽然在北京申诉，但还处在刑事处罚“监督劳动”状况之中。但父亲在这次信中没有具体提及家人受难的惨剧，而首先想到的是总后系统因他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

父亲在信中提到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他一直认为“二月逆流”是老同志们的正气抗争，他从中受了益。毛泽东为了推行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夺权，为打击压服老同志们开展了反击“二月逆流”，把那些老同志打了下去。现在总后造反派的受宠得势，等于中央承认“二月逆流”以后批老同志和“九一三事件”后搞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判反击右倾翻案”是正确的，这和中央已经否定文化大革命自相矛盾。父亲从中央对总后造反派的态度和政策，甚至让他们担任主办他的检察官、法官来参与公审等事情中看到，这里只有利用关系，没有正确和是非。军内的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党委的主力军，现在中央否定了文革而没有否定他们这些军内的造反派，完全是“以人划线”。

父亲在这次信中提到了，他准备向上面写信，但是很犹豫。因为审判之前中央代表曾到狱中与他谈话，说中央决定对他“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还会作适当安排”，示意还要出来工作。但最后还是进行了公审、给父亲定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很重罪名，并处以十六年有期徒刑。然而，公审了之后又出人意料地立即把他们几个原军队的领导释放安置。父亲认为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么对他们已经作得“过了头”，或是中央里不赞成对他们如此定罪和严惩的意见得到了重视。父亲那时判断，这样的“保外就医”之后，对他们还有可能朝更宽松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在信中说：“我刚出来，情况不会一成不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一言不发为好。”但是他考虑总后干部受株连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还是决定要向上写信。他写道：“这封信，我以相信党、关心党的团结来写，对个人问题一字不提。中心问题是要表明，我是关心因我的问题而受株连的人，并非是在做什么文章。我也会明确地提出，天大的问题由我承担责任，而不要株连无辜的人。”

父亲想先写信给他熟悉的中央领导同志，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等。他们不仅个人关系不错，而且李先念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参与中央工作的领导干部，与父亲曾一同共事，管理国家的经济和“援外”工作，对彼时中央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虽然信是写给李先念个人的，其实是写给中央的，因为他会把信及时地转给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

父亲给我写了这封信三个多月后，我到西安和他见面时，他对我说起了初到西安时的心情，说抵达那一天正好是中秋节，这个本应是家人团聚的节日过的太令人失望了。中央把他本人都放了，可是他的老伴和子女们还在受难，尚在为落实政策奔忙受罪，一家人被分离了十年还是不能团圆。父亲说，中国政治上的事情很奇怪，要整一个人的时候，上上下下都雷厉风行、争先恐后，墙倒众人推，把人往死里整。而要宽待一个人的时候，各部门都扭扭捏捏、拖拖拉拉、缩手缩脚、互相推诿，让你继续受苦，尽可能地让受难的日子延长下去，叫你苦不堪言。

面对如此困境，父亲并不气馁。他刚刚有了一点点“自由”，就开始了写回忆资料，这和其他一些与他类似情况的人相比，父亲作这件事是最早的，最上心的，并当成一件大事努力地在作。从那时起，父亲坚持不懈地写了二十一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认真回忆、用心撰写、反复修改，一直写到2002年去世前。

1982年3月27日致程光的信

承光：

三月二十三日来信和小陈以前寄的唐诗三百首详析都收到了。

你因公之便来这里很好（1），但不要担（耽）误工作就是了。

小陈上学去了吧。现在家里的事固（故）然靠外婆，但你也要关心家务，因为外婆毕竟年迈了（2）。

原总后副部长兼总后重办主任丁先国（3），还住在原办事处附近，你要方便的话可以去看看他。在交谈的时候，可以见机行事谈些问题。

父 母 字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注释：

（1）程光曾告诉父亲，要因公出差到重庆办事，去时或返回时想路过西安家中看看父母。

（2）外婆指程光的岳母。程光的爱人是医生，因工作需要到苏州医学院进修一年，不满四岁的女儿要由程光的岳父母帮助照看。

（3）丁先国（1909—2001），1927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总后副部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因受“九一三事件”邱会作的牵连被打倒，多年后得以解脱。

收信人介绍背景情况：

父亲写这封信是在1982年春节之后，他已经在西安住了半年多。那一年春节全家团聚了，我们和父亲一起住了将近十天，天天和他谈谈，了解了那些年的情况和于公审判刑后这么快就释放出来的背景，并亲眼看到了对他的安置。

公审后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人就提出要把黄、吴、李、邱放出来，并对具体的安置工作很关心。此前，中央召集承担此事的有关省市到北京开会布置安置事宜，后来又派员



去实地检查。最初，胡耀邦要求父亲他们的住房是独门独院，要有可靠的安全保障等。后因各地表示非常困难才没有落实。所以，父亲曾在上一封信中写道，“原来给我们找的不像样的地方现在都吹了。我们要找到一个落脚点还有很多的困难。”

父亲被安置在西安长乐东路的住房，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听起来好像尚可，但房子的质量很差，是为老百姓拆迁或无房户解困的“简易房”。那一次被安置的黄永胜在山东青岛，吴法宪在山东济南，李作鹏在山西太原，他们的住房面积等条件与我们相似，但房子的质量要好一些。

父亲说，在离开秦城监狱之前曾经问他对住房有什么要求？他说：“我生活从来不讲究，住的房子大小无所谓，只要有坐式马桶和暖气这两项设施就可以了。”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的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武斗遭受“喷气式”和殴打造成了严重伤残，腰弯不了，蹲下去上厕所很困难。这些年来他一直被关押着，受过各种各样的折磨，身体多病、虚弱怕冷，要求住的暖和一点。当时给他的回答是，“你提出的这些是最起码的生活要求，完全能办到”。但是父亲到了西安，恰恰住房中没有这些基本生活设施。不久冬天就到了，西北地区的气温很低，最冷的时候室内温度常在零下几度、冻得人受不了。无奈之中父亲向陕西当局提出，请他们转告中央，这种“保外就医”他实在吃不消，坚决要求回到秦城监狱过冬，那的条件比这里强，待明年春天再来陕西。

父亲明知回到秦城监狱过冬是不可能的事，但他这么公开要求，就把“保外就医”的本质揭露了，还是在继续整人！生活条件连监狱还不如。对此父亲很感慨，说他们的安置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下进行的，表示了宽松和善意。可是下面在具体执行中就走了样，还是思想路线上的“宁左勿右”。中央对某个人或某件错案落实政策时，往往都是如此。

父亲写这封信前，即1982年春节时我从无锡回西安和父亲的见面，是十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对家人有了“言论自由”的他，（前几年家属到秦城监狱探监时相互不许说“题外”的话）。我把我这些年来收集和抄录的一些文件和资料给了父亲，其中有《毛主席南巡谈话纪要》，《林彪反革命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中央文件的摘要，“批林批孔”《林彪与孔孟之道》等资料和公审期间各种报刊相关信息的剪报。父亲很高兴，说我这么有心。我们谈了很多，除了离别之情和我的工作与家庭之外，大多是关于父亲写回忆资料的事，最初谈的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总后两派的现状和“九一三”后的情况。

对于写回忆，我建议父亲先保密不对外说，特别是一些敏感的话题，毕竟他还在“保外就医”中。然而父亲却不以为然，一点也不怕，说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对一些人可以说一说。

当我提到那年四月我可能会到重庆因公出一次差。如果乘火车走北线，路过西安时要换车，可以到家住两天。如果走南线（经株洲、贵阳）就不行了。父亲说他听到了一些消息，原总后副部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丁先国受他的株连仍然在审查中，但是最近可以离开专案羁押地回家住了。父亲叫我到了重庆之后去打听一下丁先国的现状，争取能代表父亲看望他一次，一定要视情况，见机行事才可以和他谈谈。父亲叫我明确告诉丁先国，他与“九一三事件”那些所谓的“阴谋”毫无关系。

从那以后，只要我出差到各地，凡是有曾与父亲工作关系密切的老同志住在那儿的，他都叫我去联络一下，一是了解他们受株连的情况，二是介绍父亲这边的近况和他加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总后系统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多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保党委”和反对打砸抢，在造反混乱中坚守工作岗位的人。后来他们挨了整，主要是所谓“保邱”和跟随邱涉入“两谋”为前提之下做出“结论”并进行组织处理的。由此一来，那些人的问题的背景就是“两谋”的涉案外围人员，因此大多数人受到了无情打击和严惩。他们遭受的明显是冤案。

1982年4月17日致程光的信

承光、雪中：

承承去重庆出差回来后的来信收到了（1）。妈妈为你路过西安的准备工作都白费了！

最近我的眼睛经常出毛病，想配一付保护镜（2）。你为我配老化（花）镜的时候，如有合适的镜架子，则为我加配一付平光镜。镜片要有保护色，其浓度不可到墨镜那种程度，顶多有三分之一或一半即可。其色可以猪肝色或类似那种色。在电视上看到赵某在接见外宾时（3），用的那种镜子的色就很好，不知你看到过没有？

我每天都干我希望干好的事（4）。我是采用卡片式的办法去办的。不过，我的办法是学员式的卡片，可以谓之为“连动法”。从最近的情况看来成绩不理想，但也没有失望。我办的事，即使将来对社会没有什么作用，也有点“遗产”作用。我决心搞下去，这样至少可起到消磨时间的作用。

愿慷慨好，愿你们都好！

父 字

1982，4，17日

注释：

（1）程光原定到重庆出差后返回江苏时经过西安看望父母，后因工作安排的紧没有实现，故写信告知。这让父母亲的期盼落了空。

（2）邱会作那时眼睛不好，使用的老花眼镜还是1971年配的，经过十年，度数不对了，不好再用了，因此想要新配一付老花镜和一付护目镜。

（3）指赵紫阳（1919—2005），河南滑县人，1932年参加共青团，1938年加入共产党。时为国务院总理，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6月，因反对向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学生武力镇压而被撤销职务，软禁到去世。

（4）这是邱会作对他写回忆材料的暗语，因防止监管部门对他的信暗中进行检查，故不明说。

收信人介绍背景情况：

父亲在这封信里和我谈了一些生活上的事，反映了他当时的生活困境。他的眼睛出了毛病，看东西很吃力，常常疼痛。父亲想叫我为他配两付眼镜，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保护眼睛。虽然用钱并不多，但是监管和医疗部门不愿意为他承担这笔费用。他们每月给父亲的生活费很少，只有一百元，维持温饱生活都很难。父亲只好给我写信寄来眼镜的度数的验光诊断，叫我帮助配老花眼镜，同时再配上一付有色的护目镜。

父亲对我说起过，1973年毛泽东决定把黄、吴、李、邱等人“养起来”，每月生活费200元，房租、水电费另由公家支付，还安排厨师。这样的“待遇”，相当于那时候省、部级干

部的生活待遇了。后来因为受到“上海帮”和汪东兴等人的干扰没有落实。而这次父亲到了西安，已是十年过去了，物价涨了很多，因物资匮乏，有的只能高价才能买到。如果按照毛泽东那时的政策精神，给父亲的生活费应当比过去多一些才对，可是恰恰相反，比那时定的标准少了一半，其他的“待遇”也取消了。父亲说：现在的某些“当权者”说毛泽东如何整人、待人如何刻薄，而他们现在作起事来如何胸怀开阔，待人如何大度，但实际上远没有毛主席那么大气。

父亲的生活确实很拮据，他每月一百元生活费扣除房租、水电、零杂开支和订阅杂报刊费以后，再给小保姆一点零花钱，剩下的只有三四十元了。这点钱，常常是买了米就少了每月买菜的钱，留足了菜金，就缺钱买米了。“捉襟见肘”这个成语成了父亲那时生活情况的真实写照。最初，我母亲审查没有结束，问题还没有解决，她每月四十元生活费加进来也无法支撑一个家，日子过得很清苦。

父亲写这封信时已经是中国通货膨胀初显的八十年代了，为了抵偿物价上涨，职工开始有了多项生活补贴，有了各类奖金和多种生活福利，并且逐年在提高，已占到了收入的相当比例。而这一切，我的父母亲一点也不能享受。父亲每月生活费那么一点点，谁都清楚那些钱不够用，却无人过问。父亲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的，是故意再让他们吃苦受折磨，是一种附加的惩罚。

面对这些困难，父亲下决心停下每月二十几元的报刊费，天天赶到附近一个小旅馆借当天的几种报纸拿回家抓紧看，两小时以后归还，风雨无阻。若不是周围的老百姓看父亲生活贫困到这般地步，根本不相信还会有这套整人的手段。每月送生活费的干部交过来早已扣除的差不多的一点钱，常常尴尬的难为情。公安厅怕因此发生什么事，索性先从父亲的生活费中扣下些钱，买成粮食送来，生怕他们“揭不开锅”。

虽然父亲生活很清苦，但他并没有消沉。他在信中写道，“每天都干我希望干好的事”。父亲还称“我办的事，即使将来对社会没有什么作用，也有点遗产作用。我决心搞下去，这样至少可起到消磨时间的作用。”父亲话说得诙谐轻松，实际上很勤奋努力。他每天除了看报、散步和作锻炼，其余时间在全力以赴地写作。他非常投入，有时散步路过路边的公共阅报栏，看到上面写有相关消息或小的背景资料，都停下来看一看，用心地记下来，回家后写在纸上备用。

父亲长期从事军队工作，写作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事，他想了很多办法克服困难。这封信中说的“卡片法”是他发明的一种记写回忆资料的方法，因为事隔多年，对于往事很难一下子系统地回忆起来，于是他就用小纸片记下一些随时想起来的事，放在案头。父亲通常是记在一些小张的纸上，想起来一点就随手写下一点，有时在客厅里看电视或休息，想起来什么立即回到他房内把事写下来，久而久之，就积累了一堆纸条和卡片。而父亲说的“连动法”，形象地说明了他的写作过程。他写回忆资料是先写好一个大的提纲，列出章节题目，然后向里面写入详细内容，并不断增加补充。“连动法”中的“连”就是把用卡片分别记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或事件类别，排列下来，一张张地连起来。积累一多，那些封尘已久或复杂的事就显现出来了。“连动法”中的“动”就是说不是静止的，每当父亲回想起了新的内容，立即记写下来，插入到卡片组中去，然后增加到已写好的文字中，既丰富了内容，又补上了断续之处。

因为父亲年纪大了，眼睛一度不好，用笔记写卡片很吃力，而且相对于他的远期记忆力，近期回忆力差了，有的刚写下的内容，一时就想不起来记在那张卡片或纸条上了，它们放在一堆里，很难找出来，故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受父亲的启发，这个“卡片法”和“连动法”被我使用起来了。

最初，我陆续记下父亲谈的，是为了了解他的想法，好日后协助他整理资料。我最早记写

的一些卡片，有他坐下来长谈的内容，有他茶余饭后的三言两语，有陪他散步休闲时的即兴议论，也有他和我对一些问题的探讨。

为了理解某一段历史，我会问他一些问题，有的是直接问；有的是我把一些知道的不同观点向他转述，拿一些资料让他看，请他评判，这也是一种问；还有就是在聊天中不知不觉地就问了起来。他有时回答我；有时想了想，稍后再对我说；有的是没有回答，但在以后谈论别的问题时，涉及到它，让我有了答案。父亲谈的问题，有的说了一次，有的说了多遍；有时一次说的不完全，但把他多次说的集中在一起就丰富了；有的谈过了，后来有所更正；有的是他后来记起新的回忆，又会对我说，补充原来的空缺，或替代旧有的内容。我把这些记下，久而久之，积累了500多张卡片。

父亲谈起来无拘无束，事先无特定的准备和顺序，想到哪儿谈到哪儿，有时是聊家常时说到了那些。最初谈的多是“九一三”和公审，然后是庐山会议。文革初期的事，反倒是最后谈的。他让我帮着找那个时期的相关资料，我们才议论的多了。

为了方便，我把那些卡片分门别类，按时间先后排列放好，便于检索和整理。以后，我还把父亲谈的内容集中记几个本子上，等到我有了个人电脑，就及时输入，累积了几十万字的电子文档。使用电脑作事很方便，我认真地把它们整理、取舍、归纳、修正。这些用“卡片法”和“连动法”做出的资料，对我后来协助父亲整理回忆很有帮助。这些长年累月一点一滴地记了下来内容，积少成多，丰富和补充了我记写的父亲谈的史实和分析，效果很好。它成了以后我在整理父亲回忆资料的基础之一，最后逐步形成了我写的《心灵的对话》一书的雏型。

□ 摘自程光编注《邱会作家书》，明镜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

【史海钩沉】

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

• 李海文 •

2013年12月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年之际，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49页中如是记载：

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年谱1949—1976》在同一页加了一个注：

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流传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笔者认为，《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这样记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华国锋不在座。这里，我想把知道的一些情况介绍如下。

◇ 叶剑英转述毛泽东的一段话出处何在？

胡绳前辈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辰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这样写道：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这是指台湾）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胡绳的话表现出历史学家的严谨，没有讲得那么确定。

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就讲得更多些：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以下文字与前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49页注中文字相同部分略去——编者注）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随后，毛泽东传的作者解释了这段话，说：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毛泽东传》这样写的根据是什么呢？书中特别注明参见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叶剑英的这个讲话，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的，但是听到、看到的人比较少。

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这一番话。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在六所，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我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讲话。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三年，大家经常讨论“文化大革命”，总结教训，研究成因、过程及结束。叶剑英所转述毛泽东的这段话当天就在机关传开了，引起大家心灵的震动。首先是惊愕，毛泽东这样看重“文化大革命”！那还能

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预料到在“血雨腥风”中交班？那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四人帮”？华国锋是不是听了这些才下决心粉碎“四人帮”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样估计的？一连串的问题。那时思想活跃，气氛宽松，大家议论纷纷，各持己见，直抒胸臆，争论不休，人人激动，场面之热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人建议这段话应马上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当时就查毛泽东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可以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就是没有查到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胡绳当时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他完全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既没有全文引用这段话，也没有指出毛泽东是向谁讲的，只是含糊地说：“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而逢先知、金冲及是1980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对此情况并不知情。

1979年夏在六所，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讲的这段话，也没有用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但是事隔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邓力群的讲话广为传播，很快理论界、新闻界都知道了叶剑英传达的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成为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心态一个重要的史料。

◇ “血雨腥风”中交班的含意是什么？

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个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另一个是关于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胡绳专门为此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另一篇是《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可见他对此段话之重视。在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著作中、在研究“文革”的著作中这段话常常被引用。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

对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胡绳回忆：

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现在我在这篇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过了十多年，1993年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胡绳写道：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

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是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可以看出，胡绳与《毛泽东传》的作者看法略有不同。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讲的这段话？

胡绳认为：“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不知怎么，错写成4月30日，应该改正。”

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是1993年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的撰稿人之一，此电视片说这段话是毛泽东6月25日讲的。

这两位权威人士的讲法不同。

对这段话还可作更深的研究

那么，毛泽东是向谁讲的这段话？

这段话，是由叶剑英讲出来的，他不止一次讲这个话。可是没有一个人讲这个话是毛主席对叶剑英讲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传》，认为是向华国锋等讲的。1993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说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

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1993年12月播放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时，因我采访过华国锋，与他比较熟悉，我的住所与他的家很近，一天晚上我去看望他，我坐在与他临近的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谈。突然，华国锋郑重其事地称呼我为：“海文同志”，他

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格外地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电视里讲的是错的。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

2007年我得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出版1949—1976年的《毛泽东年谱》，为了不再以讹传讹，特地向正在主持编写工作的熊华源讲了这件事。他很重视，向室领导逢先知报告。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此特别向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询问此事，曹万贵秘书的回答十分肯定，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讲过此事。

据说汪东兴曾回忆，毛泽东多次向他讲过这个话。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文字的东西。

读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关于此事的记载，特别是因为时间不确定，按照编写年谱的惯例，就排在6月最后一条。而6月25日毛泽东病危了一次（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重要的史实却没有用）。毛泽东病危后，基本上讲话别人都听不清楚。（2014年1月采访阎长贵）容易让人产生误传，误以为毛泽东在病危后才讲的这个话。

我感到毛泽东年谱编者是经过较深入研究才作出如此处理的——时间上写6月，用加注的方法，将很多不确的话删去。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采纳曹秘书的话，仍然认为听毛泽东讲话的人中有华国锋。当然，对这一问题还可作更深入的研究，如研究叶剑英讲的依据是什么，华国锋为何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希望进一步查档案根据或拿出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 《世纪》2014年第3期

~~~~~

# 【百家争鸣】

## 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 汪有芬 •

《炎黄春秋》去年第5期刊登施滨海先生的文章，批评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有“硬伤”。他指的是，傅著中有的叙事是“作者发挥想象力”的结果，有的引文则是“曲解”，甚至是“无中生有”。作者的这些指责不仅涉及对傅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的评价问题，还涉及对史料的辨别和取舍问题，同时也涉及叶帅的为人和对待华国锋的态度等史实问题。笔者仅就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看法，以便与施先生和有兴趣的读者共同探讨。

施先生可能没有注意到，《邓小平时代》的两种不同中文版本，即基于英文原著的香港繁体版和经过删节处理的大陆简体版，两者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而他所谈的显然是后者。别的暂且不谈，就是他指责傅先生“发挥想象力”所写的那段有关叶帅的“爆料”，恰恰是英文原著和香港版繁体版所没有的。施先生论证了这段“爆料”缺乏根据，这很有必要也很正确。但他可能手头没有原著和香港繁体版，因而错怪了作者。实际上据笔者了解，问题的产生与作者无关。这一点待我在后面说明。

◇ 叶帅究竟是支持华国锋还是促他下台

施先生这里说的“爆料”，是指大陆简体版所谓在1978年11月11日中央工作会议期



间，叶帅和数位高官曾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小型会议。大陆简体版在写到“叶剑英很快意识到了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之后，紧接着叙述了叶帅等人召开的这次小型会议，并用以下这段文字描绘了这次私下密谈：

“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老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见大陆简体版第231—232页）

这段文字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叶帅一看到华国锋支持度在下降，就赶紧参与发起让华国锋下台的密谋。它与傅先生笔下描写的叶帅为人和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恰好相反，也与大陆已经公开的史料不符。这些再加上施先生文中的论证，应该基本上可以判定它是一段伪史。胡德平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就写道：“赵紫阳说，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后来的事态并未按他们最初所愿的方向发展，党中央终于决定让华离开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薛庆超在《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一书中，专门写了一段叶帅在1980年底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说他自己的确把华当作“后主”看待，想尽力扶助他，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旧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表示应作自我批评。

傅著两个中文版本的表述基本与上述已公开的材料是吻合的，只是整个过程说得更详尽一些。特别是香港繁体版，保留了原著中对叶帅立场的鲜明表述，也多了一些分析和细节的描写。在以下引文中，凡两个版本相同的只注明大陆版的出处，有出入的地方另有说明。

傅著第7章中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说：“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让一人独揽的危险。他们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就是由拥有全部正式头衔的毛泽东专断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的理由了。”（大陆简体版第247页）

在第12章中，有好几段专门谈叶帅在对待华国锋问题上的立场。文中说，“据说，叶帅认为华国锋应当保留职位，邓小平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但名义上仍要受华国锋的领导。”（大陆简体版第367页）

“1980年底，最强烈反对让华下台的人是叶剑英……叶帅为何要维护华国锋呢？有人揣测，叶帅本人想继续在党和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够让他如愿的人。但是叶剑英已经年迈，他不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插手日常事务。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党的干部认为的那样，叶帅担心邓小平可能变得过于专断，举止越来越像毛泽东，所以他想以保留华国锋作为限制邓小平的权力、促进党内民主的手段。”

“最终，叶帅等人的反对被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观点所压倒，他们都赞成华国锋辞职，把权力集中到邓小平及其共事的人手里……”

“叶剑英不是为自己的信念而坚决斗争的人，他更愿意避免对抗。他接受了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的决定，事实上还为自己支持华国锋作了温和的检讨。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叶帅便选择了不再与他分担这项工作，而是回到广东老家……后来当叶帅在1984年和1986年病重时，邓小平也没像过去对待周恩来那样，礼节性地前去看望他。”（以上三段文字见香港繁体版第324—325页；参见大陆简体版第367—368页，其中删节了整个第一

段以及第三段的某些情节，文字上也有所改动（笔者）

不难看出，原著中傅先生笔下的叶帅究竟是一心一意扶助华国锋，还是见风转舵促他下台。大陆简体版出现的那段“爆料”，尽管并非有意所为，客观上却形成对历史真相的歪曲。由于它与书中其他相关部分的表述明显相左，又免不了使读者产生疑惑和误解。要说这是大陆简体版的硬伤，笔者认为并不过分。

笔者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写信询问，回答说原来这段被施先生称为“爆料”的文字，在中文版定稿时傅先生已确定删除。它之所以在大陆简体版中出现，是出版过程中京港两家出版社编辑稿多次往来时出现的技术问题所致。

#### ◇ 傅著是否有意贬低华国锋

施先生把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傅著中引用胡的讲话作了对比，认为胡的讲话经过傅先生编织的“解读”，“几乎面目全非”，其中存在“曲解”，甚至“无中生有”。他并由此推想，傅著在有意贬低华国锋在推动历史中的个人作用。

我认为，施先生对傅著的这些批评，可能是由于对西方写作习惯和翻译工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了解不够而产生的误解。的确，傅先生引用胡耀邦的那篇讲话与胡的原话文字上迥然不同，但实质内容并没有多大差异。例如，胡耀邦用较大的篇幅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因此“粉碎他们如同摧枯拉朽”。傅著则说，“由于‘四五’示威活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作者没有用引号，说明他只是概括性地转述胡讲话的中心意思，而并非直接引用胡的原话，这种表述方法在西方很常见并广泛被接受。西方的作者都很重视文章的可读性。如果“照搬照抄”胡的讲话——用施先生的话说，这样做“更安全可靠一些”——如果书中凡是引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也都“照搬照抄”，这样写成的书，政治术语较多，引语也较冗长，在国外恐怕没有多少人要看。其次，中英文来回翻译也会产生问题。例如，施先生的文章说，胡耀邦批评华国锋“急急忙忙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傅著却把“急急忙忙”改成“迫不及待”。其实傅先生的原著是用的“rush”这个英文字，正是“急急忙忙”的意思，但译者译回成中文时，没有查对胡耀邦的原话，把它译成“迫不及待”，这样就偏离了原义。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特别是从事外文编译工作的人，对上述两种情况都深有体会，并不时为这类笔墨官司所困扰。

施先生在谈到华国锋对待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时引胡耀邦的话说，华国锋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这和傅著中讲他“对老干部非常粗暴”不是一回事。施先生的意思是作者夸大了华国锋的错误。其实傅著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从毛泽东逝世直到1977年3月，华国锋对老干部非常粗暴。”（见大陆简体版第366页）这里有时间限制词，而且并非作者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是在转述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引用陈云的话。胡耀邦是否转述过这句话有待考证，但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在毛逝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老干部受到的粗暴对待令人愤慨。

据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载，“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该书还说，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在上访期间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被那里的人轰出门外，连手提包也被扔了出去。所以当时中组部被人称为“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阎王殿。（见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该书第43—45页）直到1977年12月，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举荐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变。正是由于华国锋对解放老干部“不积极，不热心”（胡的原话还有

“不公正”几个字——笔者)，又继续任用郭玉峰那样的人任中组部部长，才发生了上述老干部被粗暴对待的事。如果有人把这笔账记在华国锋的名下，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再说，傅著也不像施先生所推想的那样，有意贬低华国锋在推动历史中的个人作用。恰恰相反，傅先生在书的第6章的第2—3段中，明显地为华国锋打抱不平。他写道：“按中国政治史写作中成王败寇的悠久传统，邓小平一向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启动者，华国锋则因事事紧跟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责。”“但是，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的官方历史对华国锋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中国对西方实行开放，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其实，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到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而且抛弃了毛的激进思想，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更加强调现代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为正常。华国锋还派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团出国学习现代技术。是他——而不是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并进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试验。”（见香港繁体版第162页；大陆简体版少了最后两句话，见188—189页）

在香港繁体版“转型的中国”这最后一章中，傅先生更是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起步的。”这是与国内通常说法不同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整章在大陆版中被删掉了。

#### ◇ 避而不谈邓的不足是傅的最大败笔

我对施先生的文章发表一些不同看法，并不意味着我对傅著没有意见。我认为，傅著最大的败笔是避而不谈邓小平的不足，并为他的不足辩护。事实上，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他能力有多强，贡献有多大，都会犯错误，都有他的局限性。

傅先生凭他数十年对中国和东亚问题研究的深厚功底，特别是为了写这部专著倾注了十年心血，采访和接触人之多、收集材料之广，对邓小平的不足应当是心中有数，但他在书中对此却闭口不谈。虽然读者从傅著中可以看到一些改革派官员和其他人对邓的批评，但傅先生本人却一直避免议论邓的不足，并不时为他辩解。这与整本书中他对邓的热情赞扬形成鲜明对比。以傅著第8章第1节中描写的粉碎“四人帮”后西单出现的“民主墙”为例，它曾受到党内高层的支持。叶帅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然而邓小平从开始支持它到三个月后又将其关闭，并决定逮捕和重判一些人。这种做法在多年后，在部分高层干部中仍遭到非议。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批评邓是“叶公好龙”，于光远则含蓄地说，邓的这一举动成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参见大陆简体版第254—256页，与香港繁体版对比，“叶公好龙”的评语被删节）

异常明显的是，这个事件是涉及民主和法治的根本问题，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走向。这个饱受苦难的国家，刚刚熬过十年文革，碰上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又被从民主和法治的门槛边拉了回来。但傅先生却把邓的这一行为说成是“为自由设限”，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毋庸置疑，言论自由要看到两方面：它既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容任何人侵犯，又要有明确的界限，超越了界限就要受到追究甚至惩罚。划定言论自由的界限当然是必要的，但应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来立法，不能由地方政府发布一纸规定来决定，更不是由哪个人说了就算的。也就是说，应该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否则任何掌权人都有可能沿袭过去“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做法，用专政手段来对待发表批评意见甚至只是持不同看法的人。关于这方面的立法，至今仍迟迟不见进展，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无法兑

现，因言获罪的案例更是时有所闻。而且，正因为民主不到位，缺乏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贪腐和滥权的现象才日益泛滥。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邓小平主政时留下的负面遗产。但傅先生对此又说了些什么呢？

看了傅先生这部书，第一个感想就是，中国在世界上固然需要更多了解自己的朋友，但更需要直言不讳的诤友。遗憾的是，我们往往不喜欢直言不讳的人，和他们疏远，甚至把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归入“反华势力”，相反却喜欢亲近讲自己好话的人。像傅先生这样堪称“中国通”的资深学者，写邓小平只限于引用别人的批评而不愿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恐怕也与我们不真正欢迎和鼓励批评有关。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为原《北京周报》社长兼总编辑）

□ 《炎黄春秋》2014年4期

~~~~~

### 【历史真相】

王秉璋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 文 贝 •

中国的现代史是破碎的，不真实的，某种意义上是歪曲的。

由于政治和人治的原因，很多即使是在世人的眼皮底下，也被阉割的面目全非。现实主义者总是以私利来诠释过去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当需要批评高层人士时，就以下面的功劳来否定上层。当中间层被打倒时，就只宣传两头，不提中间。当下面出现问题时，就把责任推向执行者，不会检讨上面在指导或领导的责任。王秉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每当谈及新中国的科技及建设成就时，人们提的最多的是中国的“两弹一星”和核武器发展，这是中国人最引为自豪的成就。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同时，新闻媒体几乎一致地高调赞美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不仅给予参加研制的科学家，而且对领导“两弹一星”工作的聂荣臻、张爱萍包括工作人员都大加赞美。然而，细心的人发现，在这些功臣中独独没有中间层，没有真正作出开创性贡献的院级领导们。而这些中间层恰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者，也是付诸实践的具体参与者。包括王秉璋院长，谷景生政委、刘有光政委、王诤副院长、刘秉彦副院长等。这其中王秉璋院长更是伴随中国两弹一星走过来的功臣。

1955年10月回国的钱学森，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授兼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回国后即向中央提出发展航空工业，得到中央支持和批准。1956年10月，在新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院长。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导弹研究机构，也是中国航天工业部的前身。

国防部在当时是权力很大的机构，既有决定权又有执行权，是中央军委对外的称呼。国防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担任。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了八总部体制，包括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

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其中有四个总部领导兼任了国防部副部长，以便于更好协调国防部与各总部之间的工作。由于没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区分，时任总参谋长粟裕与国防部长彭德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两家在配合上并不太好。直到1958年7月，才明确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作为全军的统帅机关，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总部体制恢复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体制。不似现在的国防部只是国务院一个军事涉外部门，对军队没有任何指挥权。国防五院在当时是正部级单位。

1957年9月7日，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关于原子武器、导弹、火箭武器和作战飞机的研制，提供样品、基地建设等方面问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

1959年6月20日，苏联片面撕毁援华国防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中断同中国签定的所有协定和合同。

1960年3月，中央命令，空军司令刘亚楼担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王秉璋任副院长，钱学森任技术副院长。由于刘亚楼的主要精力在空军，王秉璋的主要精力则放在五院，并明确由王秉璋执行五院第一书记职责，掌管全盘工作。

王秉璋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教三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建国后任空军参谋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1960年3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副院长，1962年6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4年12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1968年12月起至1971年9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2005年9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从王秉璋主政五院以后不久，国防部五院在编人数增加到30000人，技术干部增加到10000人，工人增加到11000人。导弹研制开始了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转变，主持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中国航天领域的第一部法规。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功发射。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销，成立导弹工业部，即七机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长。

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1970年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实验成功，以及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都是在王秉璋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正当王秉璋意气风发准备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大展宏图的时候，发生了林彪事件。王秉璋作为原红一军团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作战科科长、教三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调任二野11纵队司令员，后为五兵团十七军军长），深受林彪器重的问题，使他受到停职审查并收审，关押了整整10年。直到去世也没有再做结论，为此，王秉璋多次申诉都无果而终。

细心的人可以看出，中国航空航天及导弹事业在文革期间不仅没有停步，而且得到了飞速发展。王秉璋在其中功不可没。

七机部文革期间的夺权是1967年1月，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文革后为六合联营集团的董事长、福邦控股公司名誉主席）和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后被逮捕关押八年，1974年被释放。1977年患急性肝炎病死，时年还不到50岁，终生没有结婚。）。

据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了撰写钱学森传记《蚕丝》，在1993年到中国采访时，叶正光说“夺取七机部‘走资派’的权，事先还请示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

“‘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看来周恩来对此已经有所关照。然后，他让各位部长们表态，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都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于是用焊枪割开保险柜取出了印章，王秉璋被罢了官，叶正光成了七机部的一把手——‘总勤务员’。”“在第二天召开的有数百人出席的会议上，钱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次‘九一六夺权事件’对钱学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排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而且，周恩来在几个月后宣布夺权无效，权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见《文革中的钱学森》作者：华新民）

这段文章说明了两点，第一是钱学森没有倒是中央保护，第二王秉璋在文革中始终坚守在工作的前线。

而像聂荣臻、张爱萍等人，一面哭诉文革期间被批斗靠边站，一面大夸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国防科技所取得的成绩，岂不矛盾？这些人文革后不说自己靠边站则无苦可诉，而文革中的国防科技成果又是事实，不想把这个功劳让给别人，结果出现了前后矛盾的问题。

王秉璋则不然，他受到冲击是事实，然而屡次实验都站在第一线。虽然政治上被否定，但功劳应有他的一份。

王秉璋作为林彪集团的成员，虽然感到莫名其妙，自己也不知道罪在何处，但军事检察院仍“泄露重要机密罪、玩忽职守罪”，以[82]军检免字第一号被免于起诉。同样判决的还有周赤萍中将、郑维山中将、梁兴初中将、陈仁其中将、温玉成中将、丁盛少将、程世清少将、陈励耘少将、南萍少将、熊应棠少将、龙书金少将、易耀才少将等十三人。

关于王秉璋的“罪行”其本人辩护为：

关于文件问题。林立果、周宇驰1970年7月以林彪要他们搜集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为名，向国防科委要科技资料时，是为林彪研究哲学问题所需要的从外国书刊中译出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资料，不是国防科委文件资料，不是密件，不是国防机密。梁军（参谋长）在向林立果送侦察卫星材料和科委1970年第二季度科研生产简要概况时，没有告知，当然无由对之表示同意。

关于外汇问题都是梁军叫科委后勤部副部长傅德林操办的，本人不知道。而且有傅德林交待材料作证。国防科委后勤部原副部长傅德林交待说：“林立果等要去的三笔外汇，都是他（傅德林）操办的，都是梁军叫他办的。办之前和办之后，都没有向王秉璋副主任请示。”（见舒云博客）

1981年7月26日取消了王秉璋的现行反革命罪，7月28日出狱，9月份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由于王秉璋头上戴着“免于起诉”的帽子，虽然1996年国防科工委给配了一部专用小汽车，医疗待遇由师级改为军级，把生活费增加到1800元。但属于政治方面的复查平反问题仍搁置未理。由此，王秉璋一直要求复查平反，多次写信给中纪委和军队纪委黄克诚、尉建行、甘渭汉，几个人嘴上答应的恢复工作，却迟迟不办。显然是因为那个当时一手遮天的人从中作梗。说起来也确实值得生气，原来邓小平的二野战将们包括刘伯承、谢富治、陈锡联、王秉璋、王辉球、李德生、苏振华、刘丰等二野主要将领，解放后都与邓小平划清了界限。这种因爱生恨的可能是存在的。

1998年3月26日，总政纪检部案审局给王秉璋的《通告》说：“总政治部作了研究，认为王秉璋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构成犯罪。1982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其决定免于起诉。此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维持原决定不变。请将上述决定通告王秉璋。”

王秉璋不同意这个《通告》和决定，于1998年9月27日继续写信申诉，直到2005年逝世也再没有人理他。据说王秉璋的遗体一直冰冻没有火化。

由于政治原因，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宣传“两弹一星”，也很少提及王秉璋。他的很多功劳被加在了聂荣臻（分管科技副总理）和张爱萍（国防科委副主任）身上。事实上中国两弹一星的具体领导者是王秉璋，从领导方面他才是最大的功臣。

□ 选自《文贝博客》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